

#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对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建构实践

■ 相清平

政治认同是人类政治生活领域的重要理论与实践课题。作为一种同向性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政治认同是指政治主体在政治生活领域中形成的自我政治心理认同和特定政治情感，以及由此形成的彰显特定鲜明政治倾向性的政治实践活动。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奋斗征程中对于社会群众的政治认同建构问题高度重视，有着极为丰富的理论探讨和较为成功的建构实践。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赢得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是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执政安全建设、践行为民执政根本宗旨的进程中亟待攻关的重点任务之一。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以及新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充分认识到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明确强调，“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众所周知，周恩来从“建设需要吸收知识分子”的实践要求出发，通过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输入与引领、提升执政绩效与塑造良好执政形象、实际利益切实维护与细致入微的人文关怀等路径对知识分子政治认同建构进行艰辛而又极富成效的实践探索。关于执政党而言，知识分子政治认同建构是一个永恒课题。置于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特殊时空背景下，基于史论结合考察方法，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对知识分子政治认同建构的初步实践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提升知识分子政治认同度、巩固党的执政安全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 一、破旧立新：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输入与引领

意识形态是政治体系获得支持与认同的重要手段，是影响政治认同的核心要素。新中国成立初期，从政治属性来看，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明确归属于左右两翼的人只是极少数，大部分是游离徘徊于左右两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群体对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心态是较为复杂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持着拥护和满怀期待的态度，但也有知识分子存在疑虑甚至抵触情绪，总体上而言，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尚处于情感认同层面。以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们为例，虽然绝大多数院士选择留在大陆，但并不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以及社会主义的深入了解，更多是出于朴素而又传统的爱国之情和深厚家国情怀。“任何社会为了生存下去，都必须成功地向社会成员灌输适合于维持其制度的思想”。为推动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由情感性认同向理性认同转变，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尤为注重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加强对知识分子进行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输入与引领力度，较为典型的实践案例

就是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对知识分子既要团结使用并举，也要通过举办训练班、设立军政大学、革命大学等形式进行思想改造，在学习内容方面，要求知识分子重点学习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课程。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利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有力武器，“作一番更深刻更切实的批评、揭发与清除”。1951年9月，北京天津地区高校教师开展的以改造思想、改革教育为目的的集体政治学习活动，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关注，高校师生自发组织的政治学习活动转变成人民政协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组织行为。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应邀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围绕知识分子学习改造这一主题作专题报告，他“先从自己讲起”，聚焦立场和态度两大问题，深刻阐述知识分子为何要进行思想改造，引导知识分子明确思想改造的目的是改造自我，在根本立场方面，要实现在由民族立场转向人民立场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向工人阶级立场。在周恩来看来，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路径选择有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生活实践，二是自身业务实践，三是理论学习，这是“带有知识分子自己的特点，因而也最为有效的道路”。为推进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深入开展，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等一系列指导性文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也随之从教育界逐渐向文艺界拓展进而覆盖整个知识界。到1952年秋季，在这场为期一年多的集中性、全国范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涵盖了91%的高等院校教职员、80%的高等院校学生以及75%的中等学校教职员。通过对知识分子开展思想改造运动，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得到确立并进一步加强，不仅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立场、观点和态度得以革命性的改变，“不断地去掉旧的思想意识，不断地前进。”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追求政治进步的分子在思想上彻底翻身，更加主动向党组织靠拢，纷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以能够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其中一员为荣。

## 二、形兼备：提升执政绩效与塑造良好执政党形象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政党要获得民众的支持，一方面，必须有显著的真实在社会的实践绩效。对于执政党而言，执政绩效是形成政治认同的基础。另一方面，政党认同度也与公众对政党形象的认知与评价态势紧密相关。换句话说讲，在政党政治时代，良好政党形象是政党的无形资产，事关政党地位以及民众对政党的认同。良好的政党形象是提升社会民众政治认同度的催化剂和加速度。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在探索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建构探索实践过

程中，既重视提升执政绩效，也注重塑造良好的执政党形象，从而精准抓住了直接影响知识分子政治认同度的关键性要素。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一穷二白，怀疑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能力的观点颇有市场。国内外敌对势力叫嚣“共产党军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经济上0分”，甚至有人断言：“中共的胜利将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与此同时，作为刚刚经历社会制度重大变迁的知识分子群体对新生人民政权和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也颇为复杂，“共产党怎么样呢？除了极少数的先知先觉者以外，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还是一个谜”“几乎每个人脑中都有一个问号，这个问号包含了许多的疑问：从山沟里走出来的共产党能将国家治理好，让中国强大起来吗？共产党真能让人民当家作主吗？共产党执政以后会不会同国民党一样堕落腐败？”面对诸多严峻的现实挑战，执政伊始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退缩，而是认为在“人民的时代”，必须“从人民的需要，人民的爱好着眼”，高效地解决最为迫切的民生问题以及科学谋划社会发展问题，即通过有效治理绩效使人民群众“在新旧两重天的强烈对比中收获了浓浓的获得感和满足感”。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存在的亟待解决的就业、物价、社会治理等民生问题，周恩来认为，相对于发展性民生问题而言，生存性民生问题应放在首要位置来看待，必须拿出有效举措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就业、救济等生存性民生问题。此外，发展性民生问题也需纳入议事日程。如何解决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群众的民生问题？发展是更为有效的路径选择。经济建设是发展的第一要务。对此，周恩来多次强调经济建设工作极端重要性，例如：“增加生产……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经济建设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三年经济恢复工作卓有成效并开启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旧社会遗留的沉渣陋习也涤荡净尽，如同知识分子所言：“我们的共和国，是在前进，进得好，进得快”，而推动新中国社会发生这一历史性、革命性变化的首要动力则非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莫属。如前所述，政党形象是影响社会民众对政党政治认同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在探索构建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初步实践中尤为重视执政党形象建设，在形塑为民、务实、清廉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形象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一是在执政绩效取向上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周恩来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为民执政，是“为绝大多数人民谋最大利益，集中最大权力，做最大的好事”，他要求党员干部要时常反省“是不是真正在为人民服务”。二是弘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工作作风就是政党形象的外显。周恩来强调，党员干部“对待任何问题，都必须坚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老实态度”，要通过“经常地接触群众，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工作”，

进而“由不懂变为懂。”三是加强清正廉洁型干部队伍建设。新中国成立不久，周恩来就开启了通过制度化建设“有效克服官僚主义”的实践探索，政务院先后公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等文件。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的指导下，新中国成立初期清正廉洁型干部队伍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群众第一次看到了廉洁的、认真办事的、艰苦奋斗的、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共患难的自己的政府。”历史证明，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塑造的良好执政党形象也赢得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广泛赞誉，对此，梁漱溟在《国庆日的一篇文章讲话》中有一段质朴、形象而又深刻的论述，他说中国共产党“话不一定说的好，事情确能办的做”“不护短，不掩饰，错了就改。有错有错，好恶真切”。

## 三、协同共促：实际利益的切实维护与细致入微的人文关怀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有研究者认为，政治共同体满足自己利益的程度成为人对政治认同的逻辑起点。因此，执政党在构建社会民众政治认同实践中，必须在增强社会民众的发展获得感上足下功夫，真正做到共享发展成果，拿出实实在在的举措推进办好发展好社会民众的切身利益。另外，社会民众发展获得感的生成，既与物质需求的实现度有关联，也与精神需求的回应度存在正相关。换句话说讲，就是在重视利益需求因素驱动的同时，也需要给予一定的人文关怀。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这一特定群体而言，知识分子批判性的特质使得“他与政治权威结构总是具有先天性的紧张关系”。因此，政治系统给予的细致入微的人文关怀对于培育和提升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度有着难以量化的影响力。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在推进知识分子政治认同建构实践探索中，不仅重视维护和保障知识分子实际利益，而且还给予知识分子细致入微的人文关怀。

众所周知，“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但是，人的需要也是分层次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群体面临最实际也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就是生存性问题亟待解决。新旧社会更替、旧中国经济凋敝以及新中国各项建设尚在谋划推进等因素的叠加影响，使得知识分子失业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相关统计数据显示，1950年3-5月，有30多万失业知识分子。到了1951年年底，失业知识分子人数达到100万。随着经济恢复工作的迅速有效开展，失业知识分子人数总量有所下降，1952年约有43万人，占失业人员总数的15%。对此，作为新中国政府总理的周恩来，他非常重视失业知识分子安置与救济问题。1950年7月20日，周恩来签署指示《关于救济失业教师与处理学生失业问题的指示》，后又陆续发出《政务院关于处理失业知识分子的补充指示》《关于解决失业知识分子的方针和办法》《关于紧急救济的指示》等

# 以“耐心资本”理念构建新时代党员教育与作用发挥的长效机制

■ 张海蕾

当前，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对党员教育管理及先锋模范作用发挥提出了系统性、深层次的时代要求。然而，在实践中，部分基层党组织仍存在一些亟待破解的难题，比如集中表现为学习教育“打折扣”，片面追求参与率与形式留痕；绩效管理“积分化”，简单以量化指标替代质性评价；政绩导向“显性化”，过度青睐立竿见影的短期成效，而对需要长期积淀的理论武装、党性锤炼、能力培养和群众基础重视不足。“耐心资本”作为一种投资理念，其核心在于长期主义视野、价值投资导向和风险承受能力。它追求的并非短期市场波动带来的收益，而是伴随企业内在价值成长获得的长期回报，允许经历必要的创新试错周期。这一理念为破解党员队伍建设中的短视化、功利化困境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视角。党建工作，本质上是党的一项伟大的战略性人才资本投资，其“回报”体现为党员政治素养、理论水平、服务本领的提升以及党组织整体战斗力的增强。

## 一、把握“耐心培育”的逻辑必然：重塑党员教育的长周期视野

党员的成长绝非一蹴而就，其党性修养、理论自觉、宗旨意识、能力素质的培育与提升，是一个持续深化、螺旋上升的长期过程，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这与“耐心资本”超越经济周期、进行长期价值投资的逻辑高度契合。

首先，树立全周期培养理念。改变仅关注“一堂课的效果”“一次考试的分数”“一次活动的声势”的碎片化、瞬时性评价模式。党组织应着眼于党员整个职业生涯乃至更长周期的发展，制定系统性的培养规划。针对不同党龄、不同领域、不同层级的党员，设计差异化、递进式的教育内容和实践锻炼路径，确保教育的连续性、进阶性与可持续性。

其次，建立长效跟踪评价机制。探索建立“党员个人长期成长档案”，动态记录党员在数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理论学习持续性、参与深度、如持续参与理论学习、研究成果、思想汇报质量等，以及理想信念的坚定程度，如在重大考验、风险挑战面前的政治表现，还有处理复杂问题和服务群众能力的增长轨迹，如参与重大任务、解决复杂矛盾、服务群众实际的案例积累，借助信息化手段，进行纵向和横向综合分析，实现对党员成长过程的精准画像和趋势研判。

最后，营造深度学习组织氛围。推动学习教育从“被动参与”向“主动探究”转变，鼓励党员潜心研读经典著作，持续跟踪理论前沿，结合工作实际进行深入思考和研讨。党组织应提供必要的学习资源、时间保障和交流平台，倡导研讨式、案例式、体验式学习，反对形式主义，追求学习实效的长期沉淀和内化转化。

## 二、构建“耐心攻坚”的协同生态：营造党员作用发挥的容错氛围

伟大事业的推进离不开赴后继的长期奋斗，改革创新必然伴随着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这与“耐心资本”耐受风险、支持创新探索、陪伴成长的特质相契合。党组织需要营造鼓励担当、宽容失误、支持攻坚的生态环境，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

一是明确鼓励攻坚的价值导向。旗帜鲜明地倡导和鼓励党员胸怀“国之大者”，勇于承担急难险重任务，主动去啃那些制约发展的“硬骨头”，接手历史遗留的“烫手山芋”。在部署工作、分配任务时，要有意识地将党员推向挑战性强、开拓性强的岗位，为其提供施展才华、攻坚克难的舞台。

二是建立科学的风险评估与容错纠错机制。对出

# 人工智能赋能思政引领力的意识形态困境

■ 蒙婧婕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思政工作，其在提升思政引领效率、拓展传播范围上的赋能价值日益凸显，但同时也催生了多重意识形态困境。算法的价值偏向与功利性导向，导致主流价值观在“信息茧房”中被边缘化，青年价值认知面临片面化风险；主体重构浪潮削弱了受教育者的思想主体性与教育者的传统权威，动摇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基础；数据霸权的存在与数据安全隐患，则让境外意识形态渗透有机可乘，威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这些困境相互交织，制约着人工智能赋能思政引领力的有效发挥。深入剖析并破解这些难题，对于筑牢思政引领的意识形态防线、提升新时代思政工作实效尤为重要。

## 一、算法价值偏向侵蚀主流价值观

算法作为人工智能的核心运行机制，并非脱离社会语境的“技术中立体”，而是深刻嵌入设计者的价值预设、利益立场与技术局限的复合产物。当前算法设计普遍以用户兴趣精准匹配与流量高效转化为核心导向，依托协同过滤等技术路径实现内容分发。尽管这一技术逻辑并非源于主观恶意，却在迭代过程中不断强化、进而引发“个性化过载”与“主流价值边缘化”的双重危机。这一结构性失衡对青年群体的价值认知塑造与意识形态培育构成潜在挑战。

一方面，算法通过分析用户的历史行为数据，持续推送同质化、碎片化的信息内容，形成“信息茧房”和“回声室效应”。思政引领所需的系统性、整体性主流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内容，往往因缺乏即时性用户互动数据支撑，难以进入算法推荐的核心权重范围。这导致青年受众长期局限于单一维度的信息环境中，其对国家意识形态、社会核心价值价值的认知逐渐呈现片面化、狭隘化特征，难以形成全面、辩证的价值判断体系。另一方面，部分商业平台的算法设计以流量收益最大化为首要目标，刻意推送猎奇化、娱乐化甚至蕴含历史虚无主义、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倾向的内容。此类内容常以“个性化表达”“多元化视角”为包装，隐蔽性地消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侵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根基。

在算法的价值偏向与流量逻辑主导下，思政引领的传播效能被显著削弱，主流价值理念的渗透力与影响力在碎片化的信息洪流中逐渐消解，形成意识形态领域的隐性风险。算法内在的价值偏向主要源于数据训练的偏差与设计逻辑的固有局限。作为人工智能的核心运行机制，算法模型依赖海量数据进行训练，而当前网络环境中存在大量非结构化、非正向甚至带有隐性偏见的信息内容。这些数据在被算法吸收与内化过程中，往往无形中削弱了主流价值的表达权重，形成对其的结构性排斥。同时，算法的“功利性导向”与思政引领的

“公益性目标”存在天然矛盾，商业资本主导下的人工智能技术，其核心诉求是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而思政引领的核心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凝聚，二者在目标优先级上的差异，导致算法难以主动适配思政引领的价值需求。这种冲突不仅削弱了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效能，更可能导致青年群体在算法的引导下，形成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相悖的价值认知，威胁思政引领的政治方向。

## 二、主体重构引发认同危机

思政引领力的本质，在于主流价值观所蕴含的深层感召力。这一核心能力的有效实现，离不开社会公众对主流意识形态形成稳固的价值认同与真挚的情感信任。这种信任并非天然生成，而是植根于清晰的主体认知、权威的言语传递与广泛的价值共鸣之上，三者共同构成思政工作穿透多元思想壁垒、凝聚社会共识的核心支撑。然而，数字技术驱动的个体认知重构、话语生态变革浪潮，正从根本上解构着这一信任体系的形成过程。数字时代的自主思考弱化、信息传播去中心化等特征，使得传统认同培育路径遭遇冲击，进而让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培育面临主体认知碎片化、话语权威消解、价值共鸣弱化等多重现实挑战。

人工智能为思政引领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技术支撑，但若受教育者对其过度依赖，则容易陷入被动接收困境，逐步丧失思想主体性。将技术应用等同于“技术替代”，陷入了“泛工具化”的误区，导致思政工作的本质被扭曲，赋能效果适得其反。过度依赖人工智能获取现成答案、生成标准化内容，会不断强化个体的独立思考与价值判断能力，助长思维惰性，使其不再主动探索主流价值观的深层内涵。但是，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绝非被动接收所能实现的，它必须通过个体自主思辨、情感体悟与实践反思，才能将外在的价值理念逐渐内化为自身的坚定信念。一旦受教育者放弃思想主导权，沦为人工智能的“被动使用者”而非思想的“主动建构者”，就难以与主流价值观建立深层情感联结和稳定认同基础，这无疑对思政教育的价值引领功能构成了现实挑战。

技术替代导致思政工作者的主体地位被弱化。人工智能凭借海量知识库与高效解答能力，成为受教育者获取信息的核心渠道之一，使得教育者不再是知识传递的唯一核心，其专业性权威与话语主导权被持续稀释。思政工作者的思政引领的核心主体，其在价值传播、情感沟通、思想引导等方面的作用是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其权威地位的弱化直接削弱了主流价值观的传递效能。当教育者的思政引领不再具备绝对说服力，加上人工智能平台传播的信息良莠不齐、价值导向日趋多元，主流价值观的权威性便难以通过教育者的引

一系列指导性文件。时至1953年底，失业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得到安置和救济，“有能力或有技术的人早已供不应求，其他有些曾一时得不到出路，人民政府或给以救济，或给以学习的机会，使其能为人民服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不仅重视解决知识分子的失业失业等现实问题，而且强调“政治上尊重、信任；工作上放手支持；生活上关心、优待”，给予知识分子群体细致入微的人文关怀。在周恩来看来，“知识阶级”的说法是不对的，“只可说他是知识分子或知识界。”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对知识分子正确政策的引领下，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有机构成。周恩来强调，在政治上要尊重、团结和信任知识分子，对于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应给予相应政治安排，并确保有职有权。在吸收党员方面，应纠正关门主义倾向，在进步知识分子入党方面要作出计划。此外，还应具体情况而定，必要时可以“吸收党外知识分子列席一定的党组会和支部会议”，以便“让他们进一步了解党的意图，接受党的教育”。在工作上，周恩来非常重视专业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的工作环境。他主张“专家归队”，提出要处理好工作业务与学习政治的关系，知识分子学习政治“不能占用钻研业务的时间”。针对知识分子在安排和使用中存在的“用非所学的情形”“过多地参加社会活动和校内非教学活动的偏向”以及“兼职太多”等问题，周恩来强调，要“把专门的人才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应保证知识分子“最有效支配自己的工作时间”。在生活上，周恩来要求相关部门和人员要重视保障和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给知识分子……适当的待遇。”针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为了日常生活琐事”而“不必要地费去太多时间”的现象，周恩来认为，这应视为“国家劳动力的损失”。他曾明确指出，在考虑知识分子待遇问题时，“绝对不要采取平均主义的办法，不要和行政人员相比。”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应该适当地提高”。为解决知识分子生活待遇问题，周恩来不仅匿名发布了一系列指示性文件，而且明确要求行政管理人员、工会组织和消费合作社为知识分子做好服务工作。遵循按劳取酬的原则，“消除工资制度中平均主义倾向和其他不合理现象”，修改完善升级制度，拟定“关于学位、学历、知识界的荣誉称号、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优先优予知识分子内心，卓有成效地推进知识分子群体与党和政府同向同行。

基金项目：2023年度安徽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重大项目“中国现代化建构视域中的周恩来现代思想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23AHO52790）；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校级人才项目“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知识分子政治认同建构思想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XJYQ2022214）。

（作者单位：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